

競選策略與競選效能： 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三黨候選人競選行為研究

陳宏銘*

- 一、前言
- 二、分析架構
- 三、競選主軸的策略
- 四、議題立場的策略
- 五、候選人形象或特質的策略
- 六、政績的訴求
- 七、結論

本文探討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主要三黨候選人之競選策略暨其可能對「競選效能」的影響。有關競選策略之分析，焦點集中在四個方面：競選主軸、統獨議題立場、候選人形象或特質之塑造，及候選人政績之訴求等策略。本文也嘗試以「趨近的空間模型」和「方向的空間模型」之理論內涵解析候選人的統獨立場策略。

依初步觀察，候選人「競選主軸」之設定與其議題立場、形象塑造策略緊密結合，尤其是陳水扁及趙少康，這顯示競選主軸確為候選人從事選戰的根本要務。趙主打「中華民國保衛戰」的鮮明「反台獨」立場，接近「方向模型」給予候選人的建議，並某種程度主導議程的設定；陳則主打公共政策，接近「趨近模型」，黃亦同。但嚴格說起來，陳之初衷乃脫離此一論爭，黃則缺乏一致而明顯的策略。在個人形象塑造上，趙因強調意識型態，故相較陳、黃二人，著墨有限。趙所採策略之競選效能，雖因選戰激化而增強，但最終卻未能贏得選舉。

關鍵字：競選策略、競選效能、競選主軸、候選人、議題、形象、政績、空間模型

*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助教

*感謝匿名審查老師的細心審稿和鼓勵、黃秀端老師的寶貴意見、游盈隆老師的諸多啟發，以及國科會研究計畫小組成員資料蒐集的協助。本文能有機會刊登，也要感謝黃默老師對研究生投稿本學報的支持和鼓勵。當然，本文若有疏漏和謬誤之處，自應由作者個人負責。

壹、前言

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可以說是一場罕見的涉及統獨、族群甚至階級等問題的選戰。在這場選戰中，根據研究顯示，就選民被動員的情況來講，相對台灣省的六成、高市的六成三，台北市選民曾被動員的比例超過七成。並且，大陸省籍的台北市民投入競選行動，比其他省籍要來得積極，顯然大陸省籍市民的危機意識是因為候選人和政黨激化省籍意識造成的（黃秀端，1995:17）。更由於主要三位候選人間的實力相差有限，且選戰中充斥各種謀略，因此，整個選舉過程可謂高潮迭起。如今，選戰早成過往雲煙，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但從選舉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場選戰提供競選行為研究極好的個案材料。

競選活動究竟對選民的投票抉擇有多大的影響，這是選舉研究的中心課題（Finkel & Schrott, 1995:349）。早在廿多年前，Richard Rose（1967:23）便提醒我們，投票行為和選舉行為的研究同樣重要，並應建立細緻的架構來研究候選人的行為。然而，競選活動或選舉行為的研究的實質重要性究竟為何？這涉及其對「競選效能」（campaign effectiveness）的影響。「競選效能」這個概念最早是由John D. Martz和Enrique A. Baloyra（1976）所提的，其指涉的是政黨或候選人競選活動對改變選舉結果的可能性。改變愈大，競選效能就愈大；反之，則愈小。¹

理論上，對於競選效能之檢驗，可以告訴我們不少有關選民做成投票決定的過程、大眾傳播媒體形塑選民偏好的角色、選民如何處理競選過程中所呈現的新訊息之情形，以及究竟是長期的價值與態度決定選民的投票行為，還是較為暫時性的短期因素在決定。Steven E. Finkel 和Peter R. Schrott指出許多人都有看法，即當前由媒體所掌控下的選戰訊息，某種程度是欺瞞的、簡化的及操弄選民的，因此，競選效能的研究同樣對政治過程的規範性評價具有重要的意涵。此外，有關於競選行為研究的知識，對候選人與政黨也提供實用上的價值，如競選時關於資源的分配，以及如何包裝並傳達其訴求給選民（1995:349-350）。

¹ 引自游盈隆（1993:8-9）

本文擬以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為對象，探討國民黨黃大洲、民進黨陳水扁及新黨趙少康等三黨候選人之主要競選策略與訴求，包括競選主軸策略（campaign themes）、統獨議題策略、候選人形象特質策略及政績的訴求，並嘗試分析其與競選效能的關係。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目的不在於充分的解釋這場選舉的結果。因為影響一場選舉結果的因素，並不僅止於競選行為，尚包括與短期競選行為沒有絕對關係的因素，如長期選民的政黨認同因素、中期的政黨形象因素、短期競選時期間的突發性國內外局勢的重大變遷，以及參選人的數目等因素。即使就競選行為來看，文宣策略、媒體的運用、組織動員及選舉花費等因素，亦不可忽視。因此，想要充分的解釋這場選舉的結果，可能尚須借助有關這場選舉的嚴謹的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及其他資料的補足。本文是一篇針對候選人競選行為的分析，焦點集中在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訴求方面，而作者假定這些面向不僅環環相扣，且相當程度地左右了這場選舉的結果。

貳、分析架構

相較於投票行為的選舉研究，國內有關政黨或候選人競選行為的學術研究，可謂剛起步而已。嘗試提出一完整的分析架構者，僅游盈隆教授（1993）關於研究二屆立委選舉的研究，曾提出之候選人競選模式之研究的建議性的分析架構（如附錄一）。雖然，立法委員的選舉所採的「多席次單一不可移轉選舉制」與本文研究對象之台北市市長選舉之「單一選區制」不同，但此一架構仍極具參考價值。

依該架構，直接或間接影響候選人競選效能的變數有七：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訴求、組織動員的能力、競選花費、候選人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候選人政治取向、經社背景、政黨背景及派系背景。前三個是直接影響競選效能的因素。其中，有關競選花費與組織動員因資料及本文篇幅所限，為使分析焦點更集中，本文不擬處理，而將重點放在候選人的策略與訴求。

候選人的策略與訴求至少包括五個變項：政黨中心的策略、候選人中心的策略、議題中心的策略、政績中心的策略及其他。這場選戰是否依某種中心的策略在進行，可以分為兩方面來看。首先，在個別候選人中，不論是陳水扁、趙少康或黃大洲，議題、候選人、政績及政黨等方面的策略是混合進行的²。其次，就整個選戰來看，陳、黃、趙三人各自的人格特質與私事屢成攻防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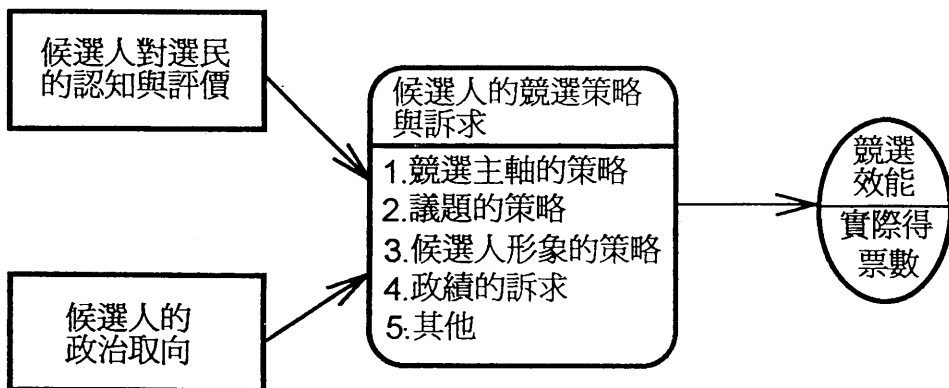
點，陳和趙過去的問政紀錄、黃的市政政績也是彼此較勁的地方，再加上統獨議題的出現，足可證明這場選戰三位候選人並非以單一策略為中心的選戰²。另外，政黨的角色恐不如議題、候選人、政績或其他謀略來得重要，以民進黨和新黨來看，黨並沒有左右候選人的能力。以陳水扁為例，選戰的進行乃以個人競選總部為核心，民進黨中央黨部很難插得上手。再如趙少康，因新黨實施所謂的「一條鞭」戰略，萎縮全國競選委員會的功能，由候選人自行負責成敗，黨部僅負責募款及捐款分配、政黨廣告等整體性事務。因此，雖然黃大洲部分，國民黨的黨機器是其選戰主力，政黨角色的分析非本文之研究範圍。

此外，依此一架構，直接影響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訴求的因素則有二個，即候選人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及候選人的政治取向。

所謂「候選人的競選效能」，我們界定為候選人獲得選票的能力。我們可以用候選人在選舉日所獲得實際票數，作為衡量候選人競選效能的指標。如此一來，候選人競選效能這項變數實際上包含了「當選與否」，但又比「當選與否」這種二分的變數（dichotomous variable）有更多的內容（游盈隆，1993:383）。此外，亦參酌競選期間的民意調查資料，加以輔助說明。

具體而言，本文將依循上述架構，主要探討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訴求為何，以及此一策略與訴求如何受到其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和個人政治取向的影響，從而又如何的影響了競選效能。據此，我們提出本文實際分析的架構，如圖一。

圖一 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競選效能的分析架構



2 陳水扁幕僚羅文嘉接受本研究小組訪談時，則認為這場選戰是以候選人為中心的。

雖然，競選行為的研究是極其重要的，一方面能提供人們了解選民投票決定的過程，進而增進政治行為研究的知識；另一方面對民主政治的運作也具有規範性與實用性的價值。但在進入實際的分析之前，在理論上必須回答以下幾個根本的問題：選民處理競選訊息的內涵為何？候選人對選民態度的資訊掌握情形如何？候選人所採不同的競選策略對選民的投票有何影響？

首先，關於選民處理訊息的能力，長久以來存在一種假定，認為選民之所以無法回憶出競選時期所發生的事，必然是因為選民對政治的關注力不夠，或是政治上的冷漠，又或者是更差的屬於非理性的情況。這種看法遭受Milton Lodge, Marco R. Steenbergen和Shawn Brau（1995）等人的挑戰，他們的研究明白指出，選民對競選的訊息是有反應的。選民接受了訊息，雖然在經過了一段時間會淡忘掉，但毫無疑問的，他們能回憶出對候選人的總括式的情感的評價（summary affective evaluation of candidates），並據此形成偏好，做成投票的決定。因此，重要的不是選民如何正確地回憶出競選時的事件、候選人的立場及評價候選人時的各種考量，而在於選民對候選人整體的評價及投票抉擇，如何地反應出他們在競選時期所處理的政治訊息。

選民是對競選行為做出反應的，但實際上競選行為又能改變多少的選民的偏好？究竟競選行為的效果為何？Finkel和Schrott（1995）對德國選民的研究值得重視。他們指出，競選活動最主要的效果在於強化（reinforcement）先前的偏好並激發（activation）隱藏的、以政黨依附與左右意識型態為基礎的投票傾向。競選行為所導致背離原先的傾向與偏好的投票情形，其比例約佔選民中的百分之十四，換言之，每七個人或八個人就有一位無法從其先前傾向和偏好來預測其投票。在一場激烈的選舉中，這些人無疑為左右選舉結果的關鍵。然而，這些選民會壓倒性的支持某一方卻也不太可能。

其次，John A. Ferejohn和Roger G. Noll（1978:492-493）則強調候選人的不確定感與選戰的關係。他們的研究指出，由於缺乏完整的訊息，候選人對選舉行為持不確定性，候選人競爭的策略性結構會深深地受到影響。其實，在當前民意調查發達的時代，候選人要想掌握選民的政治偏好並不難。每位候選人借助民調的資料與相關的選戰資訊，必然確立主觀上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此一認知與評價，又將影響其競選策略與訴求的擬定。

最後，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競選效能之關係，Michael M. Gant（1983）的研究提供不少訊息。他在研究一九八〇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時指出，競選策略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從而影響選舉的結果。Regan訴求政策面向，並避免與Carter比較個人特質；Carter則正好相反。這場選舉由於政策因素大於

個人因素，且為傾向負面性選戰，而有利於Regan的勝選。並且，一旦候選人採取不同面向的訴求，選民也可能依不同候選人所提的訴求加以評價。譬如，評價Carter者的選民較多是依候選人個人特質來論斷，而評價Regan的選民則多以政策面向為重。

以下，將根據上述架構及理論，嘗試分析這場選戰中候選人競選策略的幾個面向。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採自黃秀端教授主持、游盈隆等教授所協同主持之國科會研究——「一九九四台灣地區省市長候選人競選模式之研究」（計畫編號NSC 84-2414-H-031-003 Q3）之資料，除各式之文宣品、報章雜誌資料外，我們亦針對主要的相關人士進行深入訪談。

參、競選主軸的策略

Barbara G.Salmore和Stephen A. Salmore (1989:112)指出，選擇一個「競選主軸」(campaign theme)是候選人與其陣營最根本的工作。「競選主軸」指的是，候選人或其陣營所必需告訴選民爭取此一職位的承諾，即必須說明究竟其整個選戰是怎麼一回事。這必須確立基本的假定與選舉主調，而這些遂構成了整個選戰的大戰略之根基。一般所謂選戰的「議程的設定」(agenda setting)，也包括「競選主軸」之確立。即「議程的設定」乃指候選人提出一組競選「主題」(themes)或「議題」(issues)，藉以說服選民他比其對手更可信賴。另外，「議程的設定」通常透過所有的溝通管道加以貫徹。³

「競選主軸」的設定，也涉及議題與民意調查之角色。就議題角色而言，候選人提出議題不應當僅止於政策內容之吸引，更必須藉此傳遞其個人特質，所以，「議題是建立候選人形象之工具」。再就民調來看，雖然選戰主軸的本質可以千變萬化，但必須配合以下幾個因素：候選人條件、對手的情況、選區的特性及當前的政治環境情勢。這些，均必須仰賴民調及媒體顧問的協助(Salmore & Salmore, 1989: 113)。

在這場選戰中，國民黨黃大洲喊出「首都政權保衛戰」，陳水扁陣營則提出「市民生活品質改變戰」，新黨趙少康則舉出「中華民國保衛戰」，作為各自選戰的主軸或定位。

³ Semetko等人(1991)所著“The Formation of Campaign Agenda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rty and Media Roles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Elections”對「議程的設定」也有深入的研究。

陳水扁陣營的評估認定，台北市民重視民生議題的程度勝過統獨爭論，這種評估一方面是基於民進黨近年來不直接打台獨訴求的選戰都能有所成長，而台北市長選戰的規模更未必以全國性國家認同為戰略主軸；二來是企圖延續黨內初選時喊出的「市民主義」訴求，以市民生活而非意識型態作為選戰主體（鄭聲、陳雪，1995：46-47；陳世傑、李俊毅，1995：87）。

趙少康方面，從十月二日台北市長的電視辯論以來，言必稱中華民國，並高舉鮮明的「反台獨旗幟」。各種大型的新黨活動也必有唱國歌、升國旗、向國父遺像及向蔣介石致敬等中國國民黨的儀式，而新黨的重要成員也不諱言，新黨才是真正的中國國民黨。

有關選戰主訴求攸關選戰主軸的進行，黃大洲提出的是「台北、新象、大洲情」，趙少康強調的是「新秩序」，陳水扁則在八月底確定了「快樂、希望、陳水扁」的主訴求。其中，陳水扁並配合其形象的軟性訴求，加上兩首競選歌曲「台北新故鄉」及「春天的花蕊」，隨著「快樂、希望、陳水扁」的競選旗幟到處飄揚於台北市各個角落，效果不同凡響。黃大洲的競選歌曲則包括了「我站在你身邊」、「快樂天堂」、「中華民國頌」、「台北的天空」、「人生」及「牽阮的手」等歌曲在內。趙少康則推出三首競選主打歌，分別是「奉獻」、「牽阮的手」及「心的方向」。⁴另外，新黨的「大地一聲雷」由歌手李建復所唱，也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陳水扁的「換人換黨做做看」，趙少康的「最亂的時代，最好的選擇」，都是重要的訴求。

整體評估，競選主軸牽制了議題的設定、候選人形象的塑造，這點在以下關於陳水扁及趙少康的分析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黃大洲則較不明顯。其中，趙少康的競選主軸「中華民國保衛戰」某種程度主導了整個選戰的議題。從選戰「議程設定」的角度來看，除了投票前幾天遭受謝長廷的「每日一問」的猛烈攻勢，他相當成功的透過幾次電視辯論及政見發表會掀起了包括「反台獨」及「批李」之訴求，從而佔盡議程設定之優勢。

⁴ 參見中央日報，1994，10.26，13版。

肆、候選人的議題策略

在分析之前，擬先說明議題的概念內涵，以及「趨近的空間模型」(proximity spatial model)與「方向的空間模型」(directional spatial model)與議題研究之關係。

首先，在Richard A. Brody與Benjamin I. Page的分析中，「議題」與「政策」這兩個概念是相通的。他們將「政策投票」界定為「選民的投票行為與其政策偏好的一致性之程度」(1972:450)。此外，影響一場選舉的議題，不一定會影響其他的選舉，由此看來，選民的政策偏好，即選民對議題的態度，被視為是短期的力量。

「政策」與「議題」在概念上其實不盡然相同，較早時Angus Campbell (1960)等人對議題即有深入的分析，他們指出議題如能對個人的投票行為發生影響，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 一、議題必須以某種形式被認知到。
- 二、議題必須激發某種起碼的感情。
- 三、議題必須伴隨著某種知覺，即感受某一政黨較其他政黨能代表個人的立場。

假如議題確實能影響投票的決定的話，上述這三個條件僅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Edward G. Carmines 與James A. Stimson (1980:78-80)認為，「議題的投票」(issue voting)並非單一的現象，在理論與經驗上至少可分為二個型態，一是「困難的議題」(hard issue)，包涵不同選舉抉擇的政策上利益之有意識的計算，此根基於Downs的理論傳統，假設議題的投票是複雜的決策計算下的最終結果；二是「簡單的議題」(easy issue)，它發生在當一個特定議題的存在乃長期根深蒂固的，而造成選民對候選人及政黨有一種本能式的反應。「簡單的議題」通常具有下列三個特質：

- 一、它應該是象徵性意義的，而非技術性的；
- 二、它大都涉及政策目標，而非手段；
- 三、它較可能是些已公開辯論多時卻遲遲未能解決的公共議題。

其次，在議題的投票研究中「趨近的空間模型」和「方向的空間模型」具有高度的理論內涵。這兩者各自有一套很清楚的理論內涵，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趨近模型」認為議題的「趨近性」(proximity)是議題取向投票者在投票時最主要之關鍵，換言之，決定選民在面對不同候選人或政黨的議題立場而做選擇的關卡只有一項，即議題在空間概念上的接近性。「方向模型」則認為，議題的根本的「方向」才是決定投票的第一步因素。也就是說，選民在面對不同候選人或政黨的議題立場而做選擇時，有二道關卡決定結果，「初試」是議題的「方向」，複試是「強度」，強度最強者為選民所最愛，但不得超出「可被接受的範圍」(region of acceptability) (Listhaug, Macdonald & Rabinowitz, 1994; Rabinowitz & Macdonald, 1989; Hinch & Munger, 1992; Downs, 1957)。以下我們進一步探討二者的內涵及差別。

「趨近模型」，包含以下三個基本的要件：

一、每一個投票者能夠用假定中的空間狀態內的一個點，以顯示出其個人的理想的政策偏好位置。

二、每一個候選人的政策立場能在同一空間中以一個點表示出來。

三、投票者選擇政策立場與其最接近的候選人。

「趨近模型」假定選民對議題的認識是一種「特定性的」(specific)，在此情況下，所有相關的議題是以一種有秩序的選項被認知的；而「方向模型」則認為選民非認知到這麼精準的秩序的排列，在選民的心中，主要的議題是以「擴展式的」(diffuse)型態被概念化的，所以重要的是議題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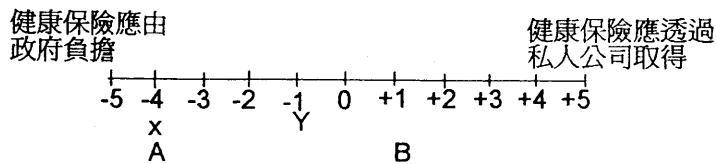
「方向模型」涉及「象徵性政治」(symbolic politics)的內涵，即議題要能產生作用，則必須它能引發選民的情緒(emotions)與情感(sentiments)，而非對議題訊息的客觀的評定。情緒無外乎贊成、反對，或喜歡、憎惡，而這就是方向理論所談的關鍵，即最根本的是對議題方向的選擇。換言之，必須在符合同一個方向的條件下，再進一步看那一個議題立場的步伐最勇邁果決，愈能得到選民的支持。但若這個議題衝過了頭，「誓死不歸」，超出「可被接受的範圍」之外，則將適得其反，得不償失。

所謂「可被接受的範圍」即選民對候選人議題立場可接受的強度範圍，這主要涉及「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問題，即就同一個方向上的強度而言，立場鮮明固然有利，但總有一個限度。在這個限度之內，選民對候選人的

議題立場均視為合理，而可被接受；愈接近限度邊緣，選民對候選人愈表示贊許，直到界線為止；反之，超出此一範圍，候選人將被認為是激進主義分子（就多數人來看），是不講道理的，非理性的，所以候選人在得票上會受到懲罰。

Rabinowitz等人並提出了計算一個議題的方向效果的公式如下：一個議題的方向效果 = (候選人位置 - 中立點) × (選民位置 - 中立點) (1989:97)。(參考圖二)

圖二 Rabinowitz之圖例



A和B代表候選人立場；X和Y代表選民立場

他們在探討選民對政黨的情感或效用的測量時，又提出另一個道理相通的公式如下：對政黨的效用或情感 = (選民立場) × (政黨立場) - 懲罰程度 (1994:114)。所謂懲罰程度，即議題的主張超越可被接受的範圍而遭致選民的拒絕。

就選舉的贏得策略來看，「趨近模型」主張候選人的議題立場的設定非常簡單，即朝空間模型中的中點靠攏便是明智的決定，如此將網羅包括「中間選民」的多數票源，從而贏得選戰。這裡涉及所謂「中間選民定律」(median voter theorem)，它指的是政治上存在著一個普遍的、結構的力量，趨使候選人、政黨及政策朝向選民「偏好」分佈狀態的中間地帶 (Hinch & Munger, 1992:10)。申言之，它的主要內涵是：(1)眾多的選舉議題可以化約為單一向度 (unidimension)；(2)每一個選民都會投給和其立場最接近的候選人；(3)兩個候選人皆會為了在選舉議題的辯論上佔上風而採取某種立場。其結果是，候選人的政見立場會向中間靠攏 (Enelow & Hinch, 1984；游盈隆，1993:380)。

但「方向模型」則認為，選民的議題立場並非在中間地帶平坦的分佈，候選人必須採取鮮明的立場，才能脫穎而出。因此，從政黨政治來看，在多黨體系中，中間型政黨將不穩固，因其無法激發選民的情感。政黨及候選人必須採

取較激烈的議題立場，如此才能同時兼顧選民所想要的包含情感的政治象徵意義及理性。

影響所及，「方向模型」對代議政治的看法也不同於「趨近模型」。「趨近模型」假定往中間靠攏是為良策，基本隱含代議士乃消極反應選民立場；「方向模型」認為當選民有清楚的議題立場時，候選人對議題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及鮮明激烈立場，並推論出代議士在政策或議題上能扮演引導選民的角色。

根據上述，則這場選舉有沒有出現議題的對話？假如有的話是什麼議題？「趨近模型」或「方向模型」所提供的理論內涵，對於分析三位候選人的議題立場及策略有無助益？以下分別探討之。

根據整個選戰過程來看，很明顯地，有兩個議題，其一為「老人年金」的爭論，其二為「統獨問題」。⁵陳水扁主張老人年金每人每月發放五千元，趙少康則推出「鈔票是不長眼睛的」競選廣告，抨擊若按民進黨老人年金來發放，將掏空台北市民口袋並拖垮北市財政。至於黃大洲，則刊登「民進黨老人年金九問」的競選廣告。因此，有關老人年金的問題，成為候選間攻防的焦點，不僅讓多數選民認知到，並燃起了不少人熾熱的情緒，這確實是一項選戰議題，包括全省在內。此一議題，涉及社會福利、財政支出較具技術性問題，選民尚需經過一定的政策利益之計算，才能形成定見，故乃屬「困難的議題」。

嚴格來說，一項議題能否符合此處的議題要件而成為一真正的議題，或進一步判斷屬於何種類型的議題，尚必須借由選民態度的研究，才可完全論斷。

真正強而有力的主導這場選戰的議題，則是以下的「統獨議題」。統獨議題根據歷次的民意調查、選舉經驗，確為長期存在於台灣社會而為多數人所熟悉的根深蒂固的議題，極易挑起人民的情緒與對立，是為「容易議題」。

⁵ 趙少康競選智囊丁庭宇分析這場選戰中議題的角色則指出：「每次選舉都有一個議題，從反台獨、反金權到反暴力都曾被使用過而奏效，今年的選戰則是『批李』」、「從一開始的區域聯防」開始，趙少康率先提出公共政策，引蛇出洞，使得陳水扁卡在公共政策上，接著，『盯人防守』出現了，趙少康大聲疾呼反台獨，最後再來幾個『三分球』，不斷『批李』，新黨一直厲行『先打陳、後打黃的策略』」。見自立晚報專訪，1994,11.29.6版。

在選戰過程中，新黨候選人趙少康首先於十月二日的電視辯論會中揭櫫「中華民國保衛戰」，點燃了統獨爭論的戰火。隨後，十月廿五日其競選總部成立時又提出「反台獨、反共產、反暴力、反金權」等主張。趙並批評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心想台獨卻不敢喊出來。趙也指新黨不急統也不急獨，主張維持現狀。陳水扁對於統獨的爭議，初期則採取被動因應的姿態，選戰中期才主動加以回應。陳在十月廿四日所辦之「希望之夜」中，首度向支持群眾表明支持台獨的堅定立場，隔天廿五日光復節當天，則明確提出「台灣是一個獨立於中共統治之外的國家」、「台灣有權以完整國際人格參與國際社會」及「台灣的前途應交由公民投票決定」等訴求。至於黃大洲陣營，輔選系統曾經認為國家認同的爭論升高有利於選局，故文宣擬攻擊台獨主張。後來國民黨內部又評估，陳水扁在光復節面對台獨問題的談話，已使北市選民趨於兩極化，而在新黨的反獨旗幟似乎較國民黨更為鮮明的情況下，將造成黃大洲選票的流失。對台獨具危機意識的選民，可能被激化轉而支持趙少康。因此，黃並左右開攻，抨擊「陳水扁的急獨與趙少康的急統」。此外，黃亦打出「保衛中華民國」的旗幟，與趙互別苗頭。從上述有關統獨的攻防來看，統獨確為本次選舉的議題。

至於候選人所提出的其他政見如交通、婦女、環保、教育……等等政策，並非完全一致，但缺乏激烈的對話，尚構不成選戰的議題，則不納入討論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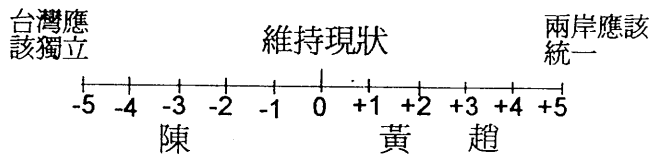
從整個選戰過程來看，可以說是由趙少康主導了議題的發展。趙少康高喊出「保衛中華民國」、「反台獨」、「李總統有急獨時間表」等訴求，確實激化了選情。趙之所以採取激化統獨爭論的策略，除舒發其統獨理念外，有其根本的勝選的考量。

首先，必須將三位候選人的統獨立場作一客觀的光譜上的定位。我們可以參考Rabinowitz等人（1989）在討論「空間模型」時所舉之圖例（圖二），重新建構三位候選人的統獨議題立場。其次，再建構候選人的議題立場的競選策略，並依本文分析架構，說明「候選人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和「候選人政治取向因素」對議題策略的影響，而後根據「趨近模型」或「方向模型」加以分析其策略的理論意涵。其實，一個完整的「空間模型」（包括「趨近」與「方向」二者），如圖二，尚必須借由民意調查同時顯示選民的議題立場與候選人的議題立場，此乃選民的主觀面。但本文乃針對候選人的競選策略為研究對

象，旨在追本溯源地探求候選人面向的立場策略。此一立場之建構，乃根據候選人於競選活動中所做的客觀訴求之內容，而由作者據此判讀其立場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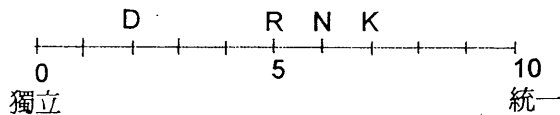
從三位候選人暨其所屬政黨長期的統獨立場來看，圖三或許是一個為多數人所認知而趨近真實的圖。圖四則是趙的統獨立場策略，其中以李登輝的位置取代黃大洲，乃顯示趙除拉高議題層次外，並同時採取抬高對手層次的兩手策略。

圖三 三位候選人統獨立場趨近位置



依本研究架構，候選人的議題策略與其對選民的認知和評價有關。依新黨輔選人士指出，經過分析、檢討，支持新黨的人約有兩種，第一、眷村子弟及榮民；第二、對國民黨沒信心對民進黨不放心的中產階級。趙少康陣營發現，兩大支持群都一致反對台獨主張，而台獨也正好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弱點，因為民進黨是「真台獨」，國民黨則是「假統一」，所以，趙少康決定全力訴求統獨問題，然後再鎖定「先陳後黃」的戰略順序。這樣的戰術可以壓抑

6 謝復生和牛銘實二位教授曾針對一九九四年省市長選舉的統獨議題，建立了受訪者〈R〉及各黨（國民黨〈K〉、民進黨〈D〉及新黨〈N〉）之相關位置圖，如下：



見謝復生，牛銘實，「究竟三黨有何不同？——台灣政黨區隔之分析」，「戰後台灣政各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國政治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1995,10.21，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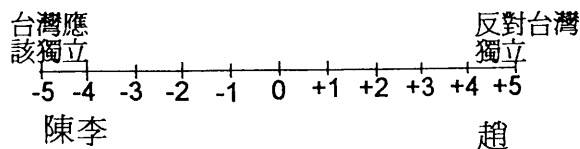
如該文所坦言，上圖中，國民黨被選民認定為要比新黨更傾向統一，這似與常識性的解理不同。且北市選戰中趙少康認為國民黨搞獨台、李登輝是急獨，顯示趙比黃大洲統一立場更堅定，故本文將趙的位置放在黃之右，應當合理。但無論如何，這都顯示趙、黃兩人乃屬於右半邊的統一立場。此外，維持現狀是否屬於統獨間的中間位置，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個人鑑於這場選舉的特性，傾向於此一處理方式。

聲勢不斷攀升的陳水扁，然後再爭取國民黨的選票（陳世傑、李俊毅，1995：96—97）。另一個相當重要的考量是，由於缺乏組織，所以需要一個馬上立即能激發感情的一個選舉策略，掀起整個選戰氣勢，否則將難逃扮演選戰中「遙遠的第三名」（distant number 3）之下場。又主攻國民黨無太大意義，須透過攻擊民進黨而爭取國民黨的支持者，「中華民國保衛戰」遂符合此一要求。

7

據此，本文推論趙應認知到圖三及選民可能的統獨立場偏好，因此認為局勢若朝圖三發展，統派票源將由其與黃共分，獨派則由陳獨佔。且民調顯示趙落後於陳水扁情況下（見附表民意調查），趙欲獲勝，必須做策略上的考量。趙雖指出新黨主張維持現狀，但在「保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要亡了」、「李登輝急獨時間表」的高昂口號下，趙採取的策略是立場鮮明而激烈的「反台獨」策略。從整個選戰時間序列來看，十月二日電視辯論會中，趙將主要火力集中在攻擊陳，並開啓台獨與反台獨的論戰來看，可以說趙的頭號對手乃鎖定陳水扁，而非現任者黃大洲。

圖四 趙少康的反台獨立場策略



趙痛打台獨，乃自認不可能拿到台獨票，打台獨牌沒有選票流失的風險，反而因立場清楚，而威脅到對統獨較模糊的國民黨。在此一兩極化的情況下，趙不時要求黃大洲退出選戰和「棄黃保陳」的放話，並於投票前指出李登輝有「急獨時間表」，其目的則在於將黃大洲趕出局。趙無非希望選戰成為其與陳二人的對決，最後統獨對決，黃票源大部為趙所取代，趙囊括統派的大部分票源，獲得勝選。

從趙的策略來看，頗符合「方向模型」要求候選人採取激烈而鮮明的立

⁷ 採自丁庭宇接受研究小組訪談之分析。

場。如前述，依照Rabinowitz等人所建構議題的方向效果公式，影響此一效果之因素有二，除候選人或政黨立場外，另一是選民的立場。一旦趙透過激烈的反台獨立場，隨之選民也受感染，從而跟隨候選人往光譜的右邊邁進。如此一來，此一議題的方向效果將極大，具體的證明是，趙的支持群中傳出「一人拉十票，十人拉百票」的驚人氣勢。換言之，「方向模型」較「空間模型」能有效解釋他的統獨議題策略。至於趙本人或其陣營智囊主觀上是否具備「方向模型」的知識，則是另外一回事。而其鮮明的立場有助於「競選效能」的提升，且尚未因此明顯逾越選民「可接受範圍」而遭受選票的「懲罰」，然而，由於其他因素的影響，選舉效能的提昇最後卻未能達到勝選的目的。

至於陳水扁方面，「候選人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如何？又「候選人的政治取向」如何影響議題策略？

他在十月廿五日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指出，經過多次民意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廿左右的人認為意識型態的問題是重要的，但另有四分之三的民衆認為，生活品質的改造才是大家所關切的議題。民進黨光靠傳統鐵票並不夠，估計當選票數應在四成到四成五之間，如何增加百分之十的選票成為競選策略思考主軸。陳認為藉著個人的政績形象，以及過去參選市議員及立委的得票情況，這次的勝選其實很大。因此，如果能順利開拓出所謂的中間的游離票源，並且選戰過程不要出什麼重大差錯的話，那麼市長的寶座是坐定了。陳陣營有一句格言：「穩贏的賭局都有可能輸掉」，所以，他認為應該提出中性的訴求，整個選戰的打法與過去民進黨強調悲壯情懷，強調意識形態的傳統打法完全不同，而是打一場很快樂，充滿希望的一次選戰。⁸

其實，陳陣營在九四年便完成一項針對近三次（八九、九一、九二年）選舉的總體選舉資料，其中發現，民進黨在台北市固有的選民基礎大是在35%—38%，因此，整體的選戰訴求重點主要鎖定在如何增加5%—10%的選票（目標群）。粗略的分析，這個「目標群」的一些共同特性是：婦女、中產階級；至於年輕選民支持陳水扁的比例則相當高，因此，政見訴求以及競選活動也就針對這些選民而設計（例如：托育政策、在競選總部成立時，請一些婦女朋友釋放和平鴿的方式）。基本上，他們認知中的中間選民是相當多元化，因此，每一項政見或活動的訴求對象都可能只是針對1%或2%的選民。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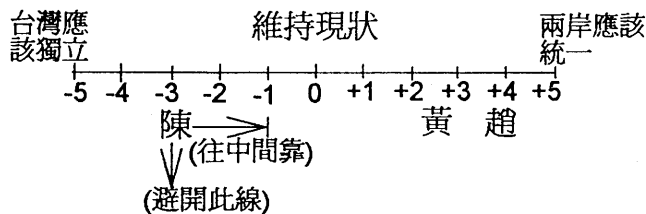
⁸ 見《黑白新聞周刊》陳水扁的專訪，第62期，1994.12.11~12.17，頁50~54。

⁹ 採自羅文嘉訪談之分析。

此外，民進黨中央黨部有一次選戰策略會議，就曾經討論過台獨問題，深入分析聲望一直遙遙領先的陳水扁要不要談論台獨？台獨是不是票房毒藥？最後下的決議是，陳水扁不要談。這點決議被陳水扁陣營視為基本戰略，但仍保持彈性空間。所以陳水扁指出，有關統獨問題，他採取的是「被動因應」而非「主動出擊」的態度，該談的時候還是要談，但決不是要學誰舉行誓師大會，或者整天喊口號（鄭聲、陳雪，1995：216-217）。

因此，陳水扁的統獨議題立場策略可以圖五加以表示。首先，他採取的是如圖中箭頭向下的避開統獨論述的方式，而後在不得已公開表述台獨的立場後，如往右的箭頭所示，儘量朝中間靠攏，但未達維持現狀的中心位置。依其觀點，確實存在所謂的「中間的選民」，而掌握一定數量的這些票源，則是致勝的關鍵。不論陳水扁陣營對選民當時的政治偏好、投票動機與投票取向的掌握是不是精確或符合學理上的「中間選民定律」，從上述關於台獨訴求的策略來看，顯然不符「方向模型」的要求。反之，從「趨近模型」來看，候選人的議題立場應往中間靠，則較為符合陳水扁陣營的思考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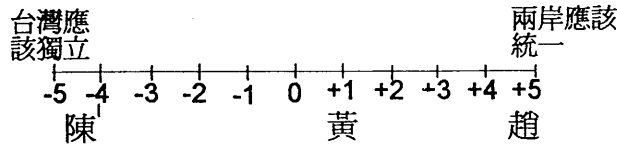
圖五 陳水扁的台獨立場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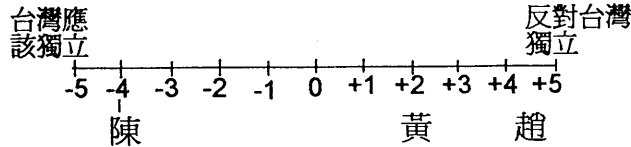
至於黃大洲方面，他一方面也跟進趙少康所喊的「保衛中華民國」、「反台獨」，另一方面也抨擊陳為急獨，趙為急統，如十一月廿六日的最後一場電視政見會中，他仍表示「他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和急統的政治立場，凡破壞族群團結和諧、兩岸關係者，都反對」。¹⁰所以，黃的策略乃讓自己居於中間的位置，而陳趙分居兩極端，坐收漁翁之利。黃的策略也符合「趨近模型」的思路，黃的策略可以圖六加以表示。但黃此一策略火力並不旺盛，其反台獨的聲音大於反急統，以致於又呈現圖七狀態，落入了趙的反台獨框架中。

¹⁰ 見中國時報，1994,11.27.6版。

圖六 黃大洲的統獨立場策略之一：反急統急獨



圖七 黃大洲的統獨立場策略之二：反台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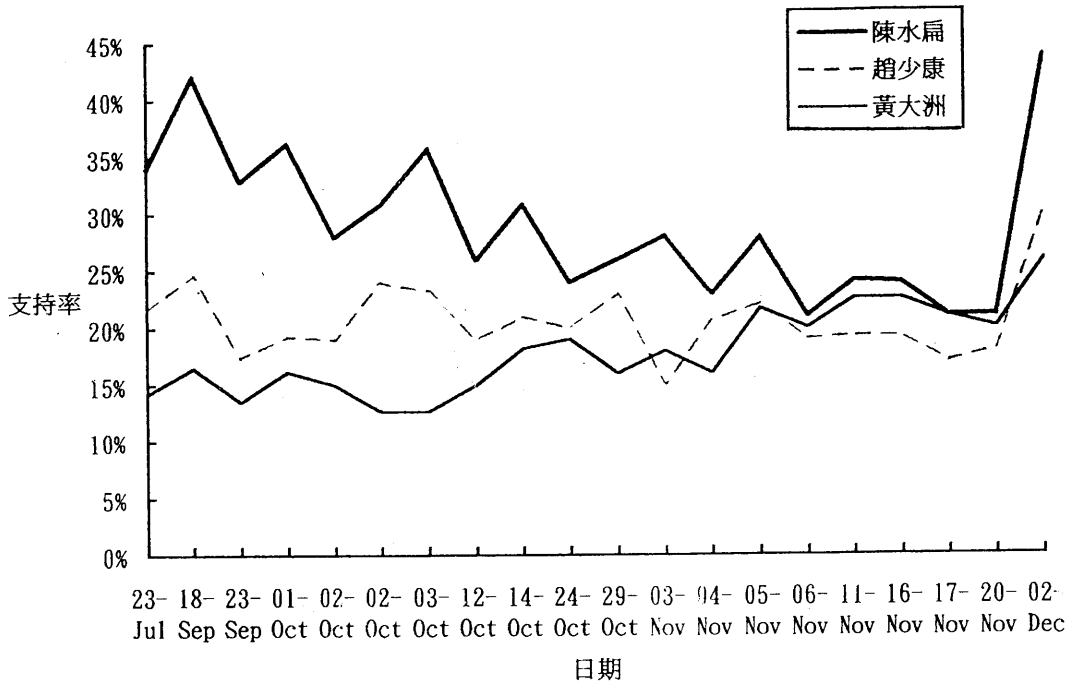
從選舉的結果來看，陳的得票率為43.67%，趙為30.17%，黃為25.89%，此一結果其實與正式競選前民意調查的支持順序一樣。¹¹但這裡必須留意的是，在整個競選過程中，除陳水扁一直保持領先外，黃大洲自十一月初期起卻呈現出領先趙少康的情況，如圖八所示。¹⁵因此，從上述結果看來，比較有趣的是為什麼黃大洲後勢看俏，但最後卻落居最後？顯然投票前一段時間出現了重大的事件，使選情產生重要的影響。

本文認為就候選人的議題策略與競選效能來看，趙少康的「中華民國保衛戰」雖然激化了選情，但缺乏選族群危機感因素，仍無法完全解釋選民兩極化的現象。且根據正式競選前、選戰過程中之民調及選後結果（參考附錄二民調資料）來看，趙除了十一月份曾落後黃之外，本來就一直居於第二名。換言之，我們無法證明趙的「反台獨」、「中華民國保衛戰」立場策略究竟正面效果大到什麼地步，雖然不致於是負面因素，因為依據方向理論，他並沒有明顯地因立場之激烈而遭致選票的懲罰。

11 根據中國時報7月23日及9月18日兩次的調查結果支持度依序為陳、趙、黃，分別為：34%—21.6%—14.2%；42.1%—24.7%—16.5%。

12 見聯合報11月6日、17日及20日；自由時報11月16日、國民黨11月3日、11日所公佈資料。

圖八 歷次民調支持率顯示圖（含附錄二所列各單位之資料）



反之，問題在於趙在十一月份支持度較黃有走下坡之虞的情況下，為什麼選舉結果能領先黃四個百分點？從競選行為的角度分析，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趙在最後一場電視政見會攻擊李登輝的所謂的「急獨時間表」訴求奏效，其二是最後幾天趙陣營所主動公佈的「棄黃保陳」風波。個人認為以後者的影響力較大，因為前者可歸屬於反台獨策略，而反台獨的策略是一個原本就存在的因素。趙陣營主動公佈「棄黃保陳」事件，從贏得策略的理性考量來看，其目的不可能是幫助陳水扁。準此，趙陣營顯然認為此一事件不論真假，將之大作宣傳則有利於己，甚至能導向「棄黃保趙」之結果。位於大安區的成功國宅內，就曾四處張貼「國民黨已棄黃保陳了，愛國的市民請將神聖的一票投給二號趙少康」的海報，據黃大洲陣營研判，這種謠言確實已讓黃大洲受到傷害（陳世傑、李俊毅，1995：191）。最後選舉結果顯示，黃大洲「可能」是最大的輸家。至於「棄黃保陳」風波「某種程度」使得黃選票流向陳、趙二人，而導致陳高票當選，則可能出乎趙陣營的預料。因此，族群危機意識配合統獨的對立，最後加上棄黃保陳效應，才可以充分解釋此一現象。或從另一角

度來看，台獨與反台獨的訴求是無法與族群或省籍危機意識分開來看的。

但假如族群或省籍的危機意識是因選舉而被激化，並且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構成台北市選戰的重要因素，那麼這是否為候選人的主觀的選戰策略之一？我們研究發現，關於此點，三黨或三位候選人均互指是對手所挑撥的。如民進黨中常會即曾發表「譴責國民黨、新黨挑撥省籍情結」聲明，中常委邱連輝表示，近來某政黨正廣為散布「執政後將把新住民（外省族群）趕下海」、「民進黨執政後將停發已退休之新住民軍公教退休俸」等謠言，並批評候選人趙少康公開在報紙廣告上提出向「本省籍中產階級」的訴求，國民黨省長候選人宋楚瑜則不斷散佈消息宣稱省籍問題將影響其選票結果；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簡漢生則抨擊民進黨主動挑起統獨之爭為其台獨建國吶喊，以致激化省籍對立及衝突，黃大洲陣營則於「陽光快報」中指出，趙少康新黨挑撥省籍情結，激化族群對立；新黨立院黨團召集人李慶華則反問：「是誰喊中國豬？是誰喊台奸、賣台集團的？」¹³趙少康則表示：「……我們如果喊外省人太團結，是不會當選的。至於外省人的危機意識，不會因為一場辯論而有所影響，如果本來沒有，也不會因為我講什麼而挑起來。它本來就在那裡，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要移民，我只是誠實說出來而已，讓大家知道台獨的危險，這不只是對外省人危險而已，對本省人也是危險」。¹⁴

總之，三位候選人所採取的統獨議題立場策略，在理論上，趙較接近「方向模型」給與候選人的建議，陳、黃較接近「趨近模型」，但嚴格說起來，陳的初衷是脫離統獨議題的論戰，而黃則缺乏一致而明顯的策略。三人議題立場交互作用所呈現的整體選戰，則非「趨近模型」或「方向模型」所可充分解釋。此外，三人分別的議題策略與競選效能之關係，可以推論出趙所採是有效的，陳則至少利可能多於弊，黃則沒有明顯效能可言。但須注意的是，這僅是表面的觀察，嚴謹的推論必須有賴關於這場選舉的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幫助。

此外，由於議題立場的策略涉及「候選人對選民的認知與評價」，因此，很顯然，民意調查在這次選戰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也是打擊對手的

¹³ 見自由時報，1994，11.10.第3頁。

¹⁴ 見中國時報，趙少康專訪，1994，10.27.4版。

一項「秘密武器」。陳水扁有「福爾摩沙基金會」爲他主持民調，趙少康也有他的競選大將丁庭宇主持「蓋洛普徵信中心」爲他撐腰，黃大洲也找來黨營報紙助陣，進行了一場空前的民調大戰。其中，黃大洲長期深受民意調查之苦，表面上雖不是很在意民意調查，但在選戰後期則推出了「超陳趕趙」的民調計畫。選前各大媒體刊登廣告，指根據各項民意調查黃已領先趙，趙支持度已慘跌至百分之十二，註定已經出局，要求趙少康信守「只要黃大洲聲勢高過他，願意呼籲新黨的選民投黃大洲」的承諾，立刻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並且，又喊出「投趙少康等於幫助陳水扁當選」。最後，惹起趙少康與丁庭宇聯名控告黃大洲違反選罷法，並打出「棄黃保陳」激烈訴求以回應之，應有或多或少的關連（陳世傑、李俊，1994：173-182）。

伍、候選人形象或特質的策略

Rahn, Wendy M.等人曾提出一個評價候選人的模型，在該模型中，作者強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有兩部分，即「能力」（competence）與「個人特質」（personal qualities）。這兩個因素產生了候選人的感情上，而後決定投票給誰（1990:187-206）。這與Lodge（1995）所指選民不見得能很準確的記憶選戰的每一件事，但卻能對這些訊息做出反應，而後得到一個總括式的感情的評價的分析相以。

在這場選戰中，候選人本身的條件，無疑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有關三位候選人對自我形象的塑造都各有其考量，以陳水扁而言，幕僚羅文嘉指出，這場選舉是以候選人爲中心的選戰。因此，候選人形象的塑造對他們來說相當的重要。陳水扁想要贏得選戰，必須在形象的塑造上更具包容力，所以希望用「快樂」、「希望」的訴求，來爭取更多人的認同。他自參選台北市長以來，幾乎可稱是笑不離口，即使是在電視辯論會上，面對對手凌厲攻擊，陳水扁自始自終都保持著可親的笑容。因此，針對外界對陳「咄咄逼人」的刻板印象加以改進，可能是其重點。至於陳的過去問政紀錄及其公共政策的宣揚，則爲強調「能力」的特質。比較起來，陳在這方面做的算是相當成功。但陳水扁在個人形象上的改造，其另一面的意義在於有意淡化其黨派色彩，強調選人不選黨。

根據現有資料來看，趙少康相較陳水扁與黃大洲在形象及特質上，則未投注太多的心力或做明顯的改變。這除了其個人知名度在北市已經很高，因而形象與特質之塑造故無需過多宣傳外，另一個合理的推測，在於他將有限的競選資源集中在特定焦點上，其中與其「中華民國保衛戰」及「新秩序」的選戰主軸極其相關。因為，同樣的陳水扁的知名度也很高，但策略卻不同。一言以蔽之，他以國家前途定位的神聖性及正當性來包裝個人的形象，換言之，二者相得益彰，他將自己昇華為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關鍵。這是為什麼他最後要直挑李總統，而於十一月廿日舉辦的首場電視政見會中，發表「李登輝急獨時間表」，提出「不支持李登輝連任」的政見，因為要將這場選舉由地方政權的選舉提昇至整個國家的層次。趙少康的策略顯然脈絡一致，軌跡可考。

黃大洲一般外界認為其形象木訥，不夠機靈，且拙於言辭。他自我辯護，指「為政不在多言」、「多做事、少講話」。對他而言，這些特質從某種角度來看，也可能轉為優點。黃乃乾脆維持其一貫特質彰顯其老實、不會說話，但會做事的優點。他並以文宣塑造其形象，如「種樹的人——溫和踏實肯做事」、「溫和笑容堅定力量」、「一個有愛的地方」。但黃過去施政政績包袱太重，其形象一直未能改善，氣勢一直很低。

在這場選戰中，負面訴求卻也充斥著選舉的過程中，例如對於對手的人身攻擊和醜化，不勝枚舉，這也深化台北市民對三位候選人的好惡，使得候選人評價的情感因素達到顛峰。Salmore指出，在美國，「負面的競選」(negative campaigning) 愈來愈多，而這與自由獨立的媒體有關。但進一步來看，其原因在於負面的訴求和宣傳確實「有效」，故「假如你要打一場正面的、高雅的選戰，則必敗無疑；假如負面的宣傳沒有作用，那麼它明天就會消失」，一位民主黨的諮詢者Michael Kaye如是說。另一位媒體的諮詢者Jill Buckley也一針見血的指出：「人們說他們痛恨負面的宣傳，然而，當他們討厭它們時，這些訴求卻也已深入其心了；正面訴求的問題在於你必須不斷的提出，反之，透過負面的訴求，民意調查數字可受其影響而在三、四天內就出現變化」(Salmore, 1989:159)。

無論如何，陳水扁之所以勝選，與其長期以來所塑造的正義的形象和選戰過程中適當的柔性的包裝，有相當大的關係。

陸、政績的訴求

左右這場選戰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是所謂的「回溯性投票」，即指選民投票的主要考慮是現任市長過去的執政表現，而非「未來式」。¹⁵黃大洲過去的政績本來就不利，而其所面對的兩位對手，皆為立法院的政治明星，相較之下，當然失色很多。依研究顯示，對於一位追求連任的候選人，回溯性的政績的評價更是他所面臨的考驗（Miller and Wattenberg, 1985）。

陳水扁的文宣相當強調其過去問政表現，如「要選就選最好的——陳水扁的成績單」、「第一名的國會議員」等。至於趙少康，則以擔任環保署長的政績與黃大洲的政績和沒有行政經驗的陳水扁相比。他並以任立法委員時民生法案通過的數目，遠超過陳水扁，為文宣重點，展現其重視民生法案，與陳水扁只重視政治性法案確有不同。且兩人均緊咬著捷運的弊端不放，使得黃面對此一問題時，幾乎很難有招架之力。黃較常舉出的政績主要是「讓台北市民共享大安森林公園」、「讓台北市民共享捷運增值」、「基隆河截彎取直」及「中華商場拆遷」等政績。只可惜就宣傳的效果來看，無法改變外界對捷運負面的評價。

選民從某個角度來看，是為一個投資者。因為選舉本身即為一集體的企業，選舉的結果及隨後政府的施政，是全體選民的投票行為集體的產物。所以，選民所投的每一張票，代表的是在訊息不完整的情況下對集體產物的一種投資（Popkin, Gorman, Philips & Smith, 1976:779-787）。從選戰策略來看，陳確能極力凸顯其過去的問政表現，並有效的攻擊黃的政績乏善可陳，使選民認為若把選票投給黃，是一種錯誤的投資行為。從而陳便能爭取更多的票源，奠定了勝選的基礎。

另外，Downs提出的「可信賴的」（reliable）與「負責任的」（responsible）的概念也有助於我們的分析。「可信賴的」意指政黨選舉初期的政策宣誓，能準確地用以預測該一期間的行為；「負責任的」指的是政黨該一期間的政策能與前期的行動或政策宣誓一致（1957:104-109）。一方面，我們推論，

¹⁵ 游盈隆，〈一省兩市選舉結果的探討〉，中國時報，1994，12.4.19版。

選民從過去黃的施政經驗來看，很難從他及國民黨所宣稱的來預測其行爲；另一方面，黃及國民黨目前的施政也未相當程度忠實的反應出前期的政策宣誓。所以黃變成既不容易取得信賴又較不利於塑造成極負責任的印象。相反的，陳雖沒有執政經驗，但證諸陳過去的表現，人們可能較容易從他競選時所宣稱的承諾合理的預測其行爲，因而利於爭取選民的信賴。

柒、結 論

本文從候選人的競選主軸、統獨議題立場、候選人形象或特質及政績等方面，探討競選策略及訴求與競選效能之關係。據此我們初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一、三位候選人均設定其選戰主軸，其中趙少康的「中華民國保衛戰」，相當程度地主導了整個選戰的「議程的設定」。而陳水扁的「市民生活品質改變戰」，雖然遭致對手「反台獨」訴求的猛烈攻擊，但表現平穩。兩人的競選主軸則與統獨議題立場策略及候選人形象、特質之塑造脈絡一貫，顯示競選主軸確為候選人競選策略之根本大計。

二、從競選行爲的角度來看，這場選戰出現二個重大的議題策略，即有關「老人年金」的議題及「統獨議題」，其中以後者較重要。三位候選人所採取的統獨議題立場策略，在理論上，趙較接近「方向模型」給與候選人的建議，陳、黃較接近「趨近模型」，但嚴格說起來，陳的初衷是脫離統獨議題的論戰，而黃則缺乏一致而明顯的策略。

三、有關候選人形象或特質方面，陳水扁有極大的改變，由「咄咄逼人」轉為「笑容可掬」，黃大洲則維持其原有特質，而趙少康則較不凸顯個人的特質，而把重點放在意識型態的訴求上。另外，候選人透過選戰的激化，及選戰中充斥各種人身的攻擊的負面訴求，促使選民北市選民對在選戰前夕，對候選人形成了總體的、情感的兩極化之好惡評價。

四、就政績的策略來看，黃大洲的政績遭受陳水扁與趙少康的兩面攻擊，幾乎很難有反擊的機會，加上陳、趙兩人均為立院政治明星，且兩人亦於文宣中極力凸顯過去問政的紀錄，必然造就回溯性的政績的評價的出現，這是黃大洲先天上的致命傷。

最後，關於這場選戰的候選人的競選行爲，尚包括組織動員及競選花費兩大變項，即便是競選策略方面，有關文宣的策略、候選人關於主要對手的設定及媒體的運用之分析，也很重要，但那恐怕是進一步的研究所應做的。

參考書目

一、中文

陳世傑、李俊毅，1995，《陳水扁贏的策略》。台北：台灣先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聲、陳雪，1995，《陳水扁兵法》。台北：月旦出版社。

黃秀端，1995，〈選民爲何參與競選活動〉，「戰後台灣政各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國政治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一九九五年十月廿一日。

游盈隆，1993，〈政治信念、競選策略與選舉動員：台灣地區二屆立委候選競選模式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二期，一九九三。

謝復生、牛銘實，1995，〈究竟三黨有何不同？——台灣政黨區隔之分析〉，「戰後台灣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國政治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一九九五年十月廿一日。

二、英文

Brody, Richard A., and Benjamin I. Page. 1972. "Comment: the Assessment of Policy Voting," APSR 66: 450-458.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Carmines, Edward G., and James A. Stimson. 1980. "The Two Faces of Issue Voting," APSR 74: 78-91.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Ferejohn and Roger G. Noll. 1978. "Uncertainty and the Formal Theory of Political Campaigns," APSR 72, 2:492-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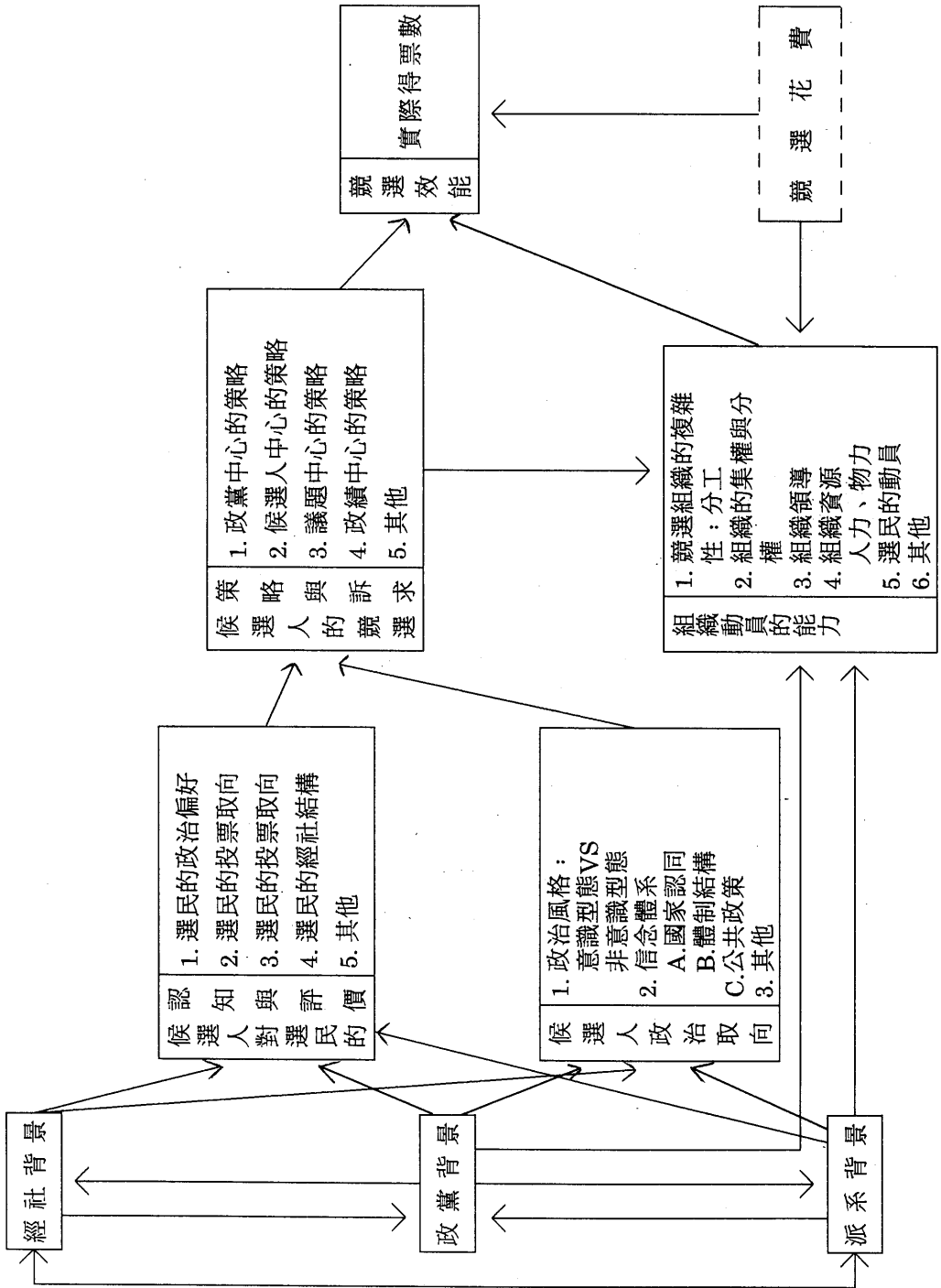
- Finkel, Steven E., and Peter R. Schrott. 1995. "Campaign Effects on Voter Choice in the German Election of 1990,"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349-377.
- Gant, Michael M. 1983. "Citizens' Evaluations of 1980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fluence of Campaign Strategies,"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1:327-48.
- Hinich, Melvin J., and Michael C. Munger. 1992. "A Spatial Theory Of Ide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4(1):5-30.
- Listhaug, Ola., Stuart E. Macdonald and George Rabinowitz. 1994. "Ideology and Party Support I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5:111-149.
- Lodge, Milton., Marco R. Steenbergen and Shawn Brau. 1995. "The Responsive Voter: Campaign Inform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PSR 89:309-326.
- Miller, Arthur H.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1985. "Throwing the Rascal Out: Polic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PSR 79: 359-372.
- Popkin, Samuel, John Gorman, Charles Philips, and Jeffery Smith. 1976. "Comment:What Have You Done for Me Lately? Toward an Investment Theory of Voting," APSR 70:779-805.
- Rabinowitz, George and Stuart. 1989.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 APSR 83:93-121.
- Rahn, Wendy M., John H. Aldrich, Eugene Borgida, and John L. Sullivan. 1990. "A Social- Cognitive Model of Candidate Appraisal," in Nieme and Weisberg (eds)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Third Edition. CQ Press: pp.187-206.
- Rose, Richard., 1967. Influencing Voters: A Study of Campaign Rationality. London: Faber.
- Salmore, Barbara G., and Stephen., A. Salmore. 1989. Candidates, Parties, and Campaigns: Electoral Politics in American.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Semetko, Helli A. ed, 1991. The Formation of Campaign Agenda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rty and Media Roles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Elections.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ion.

附錄一

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競選效能：一個建議性的分析架構



附錄二

歷次民意調查結果（百分比）：

公佈日期	陳水扁	趙少康	黃大洲	調查單位
07 / 23	34%	21.6%	14.2%	中國時報
09 / 18	42.1%	24.7%	16.5%	中國時報
09 / 23	32.9%	17.4%	13.5%	世新學院
10 / 01	36.2%	19.3%	16.2%	中國時報
10 / 02	28%	19%	15%	聯合報
10 / 02	30.9%	24%	12.7%	世新學院
10 / 03	35.8%	23.3%	12.7%	中國時報
10 / 12	26%	19%	15%	聯合報
10 / 14	30.9%	21%	18.2%	自由時報
10 / 24	24%	20%	19%	國民黨
10 / 29	26%	23%	16%	聯合報
11 / 03	28%	15%	18%	國民黨
11 / 04	22.9%	20.6%	16%	世新學院
11 / 05	27.9%	22.1%	21.7%	中國時報
11 / 06	21%	9%	20%	聯合報
11 / 11	24.1%	19.3%	22.5%	國民黨
11 / 16	23.9%	19.2%	22.5%	自由時報
11 / 17	21%	17%	21%	聯合報
11 / 20	21%	18%	20%	聯合報
12 / 03	43.67%	30.17%	25.89%	選舉結果

Campaign Strategy and Its Effectiveness: A Study of Candidates' Campaigning Behavior in the 1994 Taipei Mayor Election

Hong-ming Chen

Teaching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Past election studies in Taiwan have rarely dealt with the campaigning behavior of both the candidate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Due to this deficiency,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candidates' campaigning behavior in the 1994 Taipei Mayor Election, so as to provide a deeper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ndidates' behavior.

We focus our research on the campaigning strategies of the three candidates nominated by the Kaomintang,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d the Chinese New Party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their effectiveness. With respect to the campaign strategy, four factors are discussed: campaign themes candidates' issue positions, shaping of candidates' image or quality and their performance. Drawing from the proximity spatial model and the directional spatial model, we also attempt to explain the strategies of candidates' issue positions about the arguments of Taiwan independence.

keywords: *candidate, campaign strategy, campaign effectiveness, campaign theme, issue, image, performance, spatial theory.*